

目 录

前 言

剑河历史概况·····	张岳奇 陈远卓	(1)
剑河屯堡之安设及其消亡(再稿)·····	张岳奇	(25)
剑河辛亥革命纪实·····	张岳奇	(47)
民国时期剑河县历任县长简介·····	陈远卓	(52)
李世荣将军生平·····	陈远卓	(72)
回忆李世荣将军·····	张岳奇	(93)
李世荣诗词选·····		(102)
王天培将军蒙难前后·····	文中汉	(112)
我参加北伐的经过·····	江绍林	(116)
天锦剑黎的抗日救国军·····	陈贡章遗稿	(130)
黔东南苗族大暴动前奏·····	张岳奇	(137)
南明地区侗族人民的抗暴政斗争·····	陈远卓	(142)
南明暴动事件参与者的回忆·····	杨再清 杨再根	(155)
刘光前被害经过·····	刘光德	(162)
黔东南事变亲历记·····	王国基口述 吴正整理	(168)
民国时期剑河的天灾匪祸·····	刘光德	(174)
剑河教育史略·····	杨胜溢	(180)
阮路杀害闵世俊夫妇的前前后后·····	杨胜溢	(190)

阮略其人其事·····	罗伯鼎 (196)
杠子岭·····	刘光德 (198)
小广侗家的婚姻习俗·····	陈运卓 (205)

剑河历史概况

张岳奇讲述 陈远卓记录整理

一、剑河苗、侗族的来源及其发展

剑河是个少数民族聚居区。说到剑河的历史，苗、侗两个民族应占重要地位，至于汉人，那是清雍正以后，城里面和屯堡才有汉人居住，在此以前，剑属清水江流域的绝大部分地区属于苗族聚居区。南明、盘溪一带属于侗族聚居区。要探讨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这两个民族的来源及其发展。

对侗族的来源，我没很仔细的研究过，有人主张来自广西“骆越，”他们的根据是民歌，我认为单纯以民歌确定族源，未免有些牵强。以我的见解看，还是来源于“三苗。”三苗原在左洞庭，右彭蠡，即从洞庭湖沿长江下，武昌、江西九江等地都属于三苗之区域。淮南子曰：“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史记上也说：“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这说明挨近广西的这一大片区域，土著民族就是“三苗”。

从历史和地域上看，侗族实际上也是从江西迁来的。我查过王天培的家谱，他们祖先来源于江西。南明、盘溪一带好多侗族同志都说自己的祖先从江西迁来。这是符合西迁这个说法的。从根本上说，我认为侗族也是来源于“三苗，”“三”字不能当一二三解释，《汪中续学篇》里讲“三”是多数

的意思，郭沫若也说过：古人用字，“三”为最多，“三”为最神秘，举凡“三才”、“三光”、“三宝”等等。很多事实说明，“三”是众的意思。因为当时，左洞庭、右彭蠡，苗族居多，其他如瑶族、水族、侗族等等。当时是不能区别得很清楚的，于是用“三苗”即众苗的意思，直到明清，侗族还说是苗。明清的文献没有举出侗族，比如说乾隆的谕旨上都是说苗，侗族也说成是苗。《清江志》上划分很多寨子，哪个寨子归哪个土千总管辖，哪些寨数是汉寨，哪些寨数是苗寨。讲苗寨还可以，讲汉寨完全是错的。因为在当时除了苗寨便是侗寨，根本还没有出现一个完整的汉寨。南明设治较早，元朝就有个南木洞长官司。明洪武五年，辰州卫长官刘宣武来招降十三洞（即黎平管辖的十三洞），那时候就设了赤溪浦洞长官司，以土酋吴世懿任长官。到永乐七年，又由军队里派来杨通谅任正长官。从那时起，便有了一个正长官，一个副长官，都是世袭长官。朝廷以这两个长官统治这个地方。一直到清朝，张广泗来镇压苗族的时候，两长官带士兵来助战以后，才改设土千总（长官改成土千总）管理这个地方。赤溪浦洞也属过思南的田家，后来又隶属湖南新化，以后又改归黎平。清乾隆三年才拨过来，才把赤溪浦洞拨归清江厅，以前剑河不上粮，只有南明有粮，有几十两银子的粮。侗族情况大致是这样。我对侗族没有研究，谈不出更多的情况。

至于苗族，我对剑河苗族的历史研究较多些，也写过几篇文章。我在写《雍正前剑河苗族社会考》这篇文章时，碰到的难题首先就是苗族的来源。有关苗族的来源，明清时梁启超同章太炎争论了几十年，也没有争出个结果。解放

后，全国民族会议，西南民族会议及贵州省民族学会召集过几次会议讨论，也没有把这个问题统一认识。

我写雍正前苗族社会，首先要解决的是苗族族源的问题，而苗族的来源又是这样复杂，争论的焦点是“三苗”。在《尚书》里讲有“三苗之国，三苗之君，三苗之王。”争论的第一个问题是从地理上看，苗族来源于“三苗”，因为左洞庭，右彭蠡，苗族迁徙上来是有据可考的。但如果依《尚书》之说，就产生了一个疑点，苗族在那个时候就有了国，有了君，有了王，为什么到后来反转没有了呢？这合乎历史发展规律。从一般的历史看，在少数民族史上，苗族从一世纪到三世纪尚处于原始社会，到宋都还有图腾信仰，《尚书》所指的年代是在纪元前若干年，这不合进化发展原则，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直到一九八〇年在贵阳召开的民族史讨论会上还争论。我运用恩格斯与列宁的国家学说来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社会发展，到夏才进入奴隶社会，国家是在奴隶社会阶段才产生的，夏以前还是部落社会，怎么会搞出国，搞出君，搞出王来呢？这中间我批判了经院哲学，经院哲学是把所有书上的东西都看成圣经，不敢触动。我用恩格斯“国家是一个级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这个原理，否定了上述“三苗之国，三苗之君，三苗之王”的说法。那时不可能有国有君有王。文章写好后，我将其送到贵州民族研究所，民研所的同志看了标题便对我说：“算哪，张老先生，搞这东西要有条件，要占有大量的文献资料，还是让那些专家学者搞去吧。”听他们这一说，我只好撂起啦，后来我又把它送到中央民族学院审查，中央民院，在我们国家总算个高等民族研究学府，他们看后作了评

价，指出：作者提出大量资料，认为“三苗”是左洞庭，右彭蠡的土著民族，论据也比较充分。这篇文章又转到贵州民研所，结果还是没有发表。到了一九八一年冬天，《苗族简史》审稿讨论会在贵阳召开，全国苗族的知识界人士大都集中到那里来，这才肯定了“三苗”是苗族的先民，我的这篇文章到此才获得发表。文章论证了三苗是苗族的祖先，三苗是左洞庭，右彭蠡的土著民族。

到禹伐三苗，这时已进入了奴隶社会，禹来征伐三苗，我搜集的那些资料说明，最初进入奴隶社会，杀人是很惨的，他们不留奴隶，不过左洞庭，右彭蠡地域很宽广，禹的人又不很多，他当然就杀不绝。三苗这才被迫西迁，从洞庭湖迁入沅江。这时楚国的楚人已经有很大发展，当时的交通工具很落后，“剡木为舟”，就是把大木头刨空了当成舟船，这个情形，要渡过洞庭湖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有湘江、资江阻隔，三苗与中原地带脱离接触，从此，文献上找不到三苗的记载了。到了东汉，光武帝由长安迁都洛阳，这时正是所谓的“光武中兴”时期，他想征服西南的少数民族，四次派兵伐五陵五溪蛮。这样，三苗又被逼着从沅江再度西迁。有一支由潯阳江上，有一支由清水江上，同时进入黔东南。这就构成了现在的黔东南的苗族。这只是个大概。我们研究历史，要有根据，要依据历史文献去考证，写史要写信史，没有根据，乱说一通，遗害后人。

二、剑河第一次苗民大起义

从东汉时期起，苗族便在黔东南这块土地上定居下来，这里山高谷深，浪急滩险，清水江中下游是不能徒涉的。因

此与外界隔绝，同时又由于苗族对历朝的统治者并不侵犯，这就形成了苗族社会结构的特殊形式。以“鼓社”为例，一个鼓社就是一个政治组织，一个军事组织。在台拱，九个鼓社结成方里一个部落。在剑河则是寨自治，比如说公鹅寨，还另有几个子寨，这就是一个组织。他的这个特殊的社会组织以三根支柱组成，这就是“议榔、牯脏头、理老。”苗族没有经过奴隶社会，没有产生过全民族公认的领袖人物，没有对其他民族进行侵略扩张，他们自耕自食，自织自穿，从不侵犯其他民族。所以，在清以前，虽经晋、魏、南北朝和唐、宋、元、明若干朝代，中央很少对黔东南苗族用兵。只是在明朝中叶，朝廷曾派兵打过香炉山，在凯里设过土司，八寨么坝长官司，其余剑河则称“化外生苗。”台拱称“九鼓生苗。”“生苗”作何解释呢？《镇远府志》上这样讲：有土司管辖者为熟苗，无土司管辖者为生苗。这就是说，剑河、台拱、雷山等几个地方的苗族，在清雍正以前，不仅无汉官管辖，连土司也没有管辖过。在那一段历史上，苗族社会比较安定。生产也较发展。苗家山寨筑造的层层梯田，就是苗族先民们在那一阶段开垦的。雍正以后没有开田，这随处都可以找得出证据。比如柳堡的屯田，他们现在去挖荒田，那田中的树木都有一抱多粗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雍正以后，不特没有开田，而且荒田，证据随处都可以找到。

《清江志》上有过记载，大意说在雍正前，这片土地不仅没有汉官管辖，连土司也没有设过。到了雍正四年（一七二六）满州鄂尔泰看到周围三千里苗疆没有归向管辖，就想把这块地方收归统治。这件事，雍正后来承认办错了，乾隆也承认办错了。鄂尔泰也不得不承认办错了。自请皇上削去他一

等伯和大学士爵位。张广泗把这个地方血腥镇压下去后，也不得上本请罪。这是《清实录》上讲的。这是个什么道理呢？当时鄂尔泰对雍正说：只是清理一下这个地方，登记户口，谁知后来并不是这么回事。

雍正六年（一七二八），鄂尔泰派副将张禹模带两千多兵，深入苗地驻柳罗塘。他们先在清江北岸各寨清理，利用一些汉人作通事，动员苗民归顺。清水江北岸有些寨子在军威胁迫下，勉强归顺了，南岸的寨子以公俄为首的各寨不同意归顺。当时公俄寨的力量比较强大，还联络了别的一些寨子，经常利用夜晚到清兵营里去摸夜螺蛳（偷袭）。清兵感到骑虎难下，于是便下令将贵州全省的兵力调集镇远，由张广泗指挥。张广泗率领兵力进驻剑河上渡河柳受一带。到了那里以后，发现公俄寨联络了摆尾、白紫、白汉等苗寨，订立联盟共守江防，清军无法过江。张广泗当时用计，声称只要把北岸的户口清理一下就撤兵。南岸的首领们听说要撤兵了，便疏于江防，对船隻的管理也不那么严了。这就给清军造成了可乘之机。

雍正七年（一七二八）古历五月十四日，镇远知府方显探明这个情形，确信苗兵已放松警惕，就在当天晚上，在柳受附近集中了四十多只木船，加上南岸放过去的十多只，共集中了五十多只木船，连夜渡江，将所有清兵全部渡过南岸。派游击姆椿龄带八百兵上山关口，堵截外来的援兵，然后攻公俄寨之左。守备徐春达带五百兵攻公俄寨之右，张广泗亲自督率精兵攻中路。全省兵力不下五六千人，公俄只一小寨，失败是在所难免的。站在苗族人民的立场上来写历史，打败仗是不好写的。我在文章中写的是：“公俄以一寨

之力，抗全省之兵，众寡之势，既不相如，武器精良，又相悬殊，然尤奋起抵抗，杀敌甚夥，终因清兵炮火密集，势难久支，才掩护家属，转移后方”。所以，仅公俄失守，打了败仗，并非一败涂地。

占领公俄寨的当天，张广泗算定，苗以夜袭为奇计（摸夜螺蛳认为奇妙的计策），他于是把兵散伏四面，将寨子空起来等待。果然，公俄寨不甘心丢掉寨子，夜晚全体出动来摸夜螺蛳，谁知摸进去是一个空寨子，四面的炮火一打，他们背不住，又不得不退出来。《清江志》上写：“公俄寨失守，苗兵堕岩者不知其数。”其实公俄寨附近并没有什么高岩，只是被清兵杀戮了不少人。他们打下公俄以后，接着就打鸡摆尾，当时鄂尔泰的手令是这样写的：“公俄逼处清水江，宜首先剿灭。”“剿灭”这个字眼，从公文上讲，就是可以见人杀光。从五月十五日占领公俄寨那天起，确实杀了不少人。当时有个汉人叫曾文登，湖南人，他因做生意来到苗寨，与苗寨结下深厚情谊，见到清兵这样残杀苗民，于心实在不忍，便自缚赴清营，承认夜袭清兵，攻打清营等等都是他出的主意，要杀杀他一个，不要乱杀无辜。张广泗杀了他，又利用一些汉人作通事，动员苗民归顺。当时有个王家土司叫王开甲，他就说服了南哨、昂因、昂宿等苗寨归顺。清江北岸的者磨、巫包、雅磨等苗寨都投降了，南岸的中都、南脚、摆尾、久仰等都归顺了，没人再反抗了。这样，到雍正八年（一七三〇）就设治。张广泗有云：“清水江到此陡折而南，萦回盘旋，故名清江。”清江之名就是这样来的。于是就在这里设清江厅，厅等于县。“厅”原是代表官府的衙门，他用这个厅的意思，就是将官府的衙门设在这

里，清江厅厅主当时叫同知，是天柱调来这里任同知的，除同知而外，还有县丞，通判等官名。清江厅下设柳霁分县，县丞也是由天柱调来的。

到了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年）张广泗又打下了台拱，将这里的同知移到台拱，又将镇远通判移作清江通判，台拱同知。在《黔南史略》上就这样写。设治以后，清廷以为这个地方被征服了，论功行赏，鄂尔泰封一等伯，授大学士，张广泗提升为两湖总督，都升了官。可是好景不长，这里的苗民并没有心悦诚服。他们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认识到过去之所以吃亏，就是因为寨自为治，人家打这个寨子时，其他的寨子袖手旁观。结果被人家一个寨子一个寨子地收拾，大家都吃了亏。认识到这点，于是大家串连起来，情形就变了。

到了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包利、红银在鸡摆尾起事。包利是古州色同高表人，原是个侗族，那时他称苗王，榕江现在还有苗王庙，就是为纪念包利而立的。《古州志》上也有“苗王老包”之说。包利原在那边造反，称苗王，当地长官奏折到朝庭，清庭派兵来剿，在那边站不住脚了，才跑到这边来串连，后在鸡摆尾起事。红银是当地人，还有一个老伦，他们三个联合在一起，集中了好几千人，想围攻清江城。当时的贵州提督哈元生得到塘报，就亲自带兵来攻打他们，来到巫交沟，遇到包利、红银的义军阻击，这时台拱、凯里的义军都起来了，便将他逼上莲花屯（莲花屯在台江剑河两县的交界处，距巫交沟不远）。凯里被义军收复后，各地都纷纷起来响应。这时哈元生在莲花屯守不住了，冲下来想逃跑，途中千总被打死，军械物资丢失大半。这一来事情就闹大了，不单是黔东南和剑河，整个贵州都动起来了。

雍正闻报，知道这件事情办错了，想丢手不管。在后来乾隆谕旨上引用当时雍正的话说，利其土地，它本就在我版图之中，利其人民，他从来就未归王化，利其田赋，他那里本来就没田赋，如果在那里设兵设官，从他那里收来的还抵不到付出的万分之一，我们为什么要去搞这个事情呀？所以雍正就想放弃不搞。可是他已处于骑虎之势，欲擒不得，欲放不能。整个贵州的苗族都动起来了，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才又派刑部尚书张兆来收拾。张兆体察雍正的心意，他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想采取以抚为主的策略，所以迟迟不动。雍正死，乾隆即位，尚未改元，还沿用雍正的年号。这时他为了顾全皇考（雍正）的面子，更不能放弃，这才又将两湖总督调来。

张广泗来到贵州时，正逢哈元生打了败仗，这个哈元生原称杨威将军，董芳是他的副将军，只一仗便被苗民义军打得丢盔弃甲，清庭派张兆来此也没有办法。这时雍正刚死不久，乾隆即位，称“雍正丙辰”（一七三六年），张广泗来时，调来五省兵力，计有湖北襄阳镇总兵焦应林，广东惠州协副将马成林，湖广副将李奇，云南承北镇总兵刘永贵，副将董芳等等。五路大军加上贵州原有兵力，共约三万余众，统由张广泗节制指挥。他派副将军董芳驻六甫塘，副将柳定国由八弓抄小路进攻巫包，巫包被攻下之后，便解了柳罗之围。接着，柳定国乘雾进攻，搞掉了柳罗大寨，董芳也乘势搞掉了六甫寨，他在六甫一个寨就杀了一百六十二人。不久，又解了清江城之围，张广泗随即进驻清江城，策划打鸡呼党（又称六马头即今久仰一带），总之，那一次杀人是很残忍的。张广泗将这里的苗民起义扑灭之后，又亲率大军进攻古州，一举将古州踏平。清水江下游也派了游击赵璧，攻克九

寨、柳寨，一个寨子一个寨子地踏平。这一次苗民死伤很惨，青壮年几乎被杀光，老弱者躲在箐山里头，被搜山者搜出来杀掉。没被杀的，亦被张广泗集中起来，将其流放到贵阳上边的平坝、安顺、兴仁等地去，至今那边的苗族还可以同这里的苗族对话，这当然不单指剑河、台江、雷山、凯里，其它好多地方皆如此。这件事奏报到清庭，乾隆在谕旨上说：“流放他乡者如此之多，朕心殊觉不忍。不过此乃伊等自取，卿扬国之威，那是很可取的。”这一来，被捉住的苗民大部分被遣散他乡，清水江中下游再也反抗不起来了。

接着，张广泗就在这里安屯设堡，安设土官管理苗寨。将所谓绝田划作屯田。对于安屯设堡这件事，乾隆不那么同意，旨意叫他们另想办法。不过，当时清朝政府切盼长治久安，张广泗又以身家担保，乾隆便听任张广泗安屯设堡了。

安设土官，就是把那些通事（替官府说服苗民归顺的汉人），安成土官管理苗寨，哪个说服哪个寨子就让他管理那个寨子，所谓的土千总、土把总、土外委、土舍、通事等等，好几级官。下革东王家，他顺着太拥河说上去，一直说服到昂因、昂宿，他就管那一条河沿河两岸的三十几个寨子（这事在清江志上有记载），官封土千总。此外，也有管一寨或两三寨的。有人说清朝对黔东南的用兵是“改土归流，”言下之意是说清朝为了国家的统一，是好事，用兵是正当的。这种说法，我认为是在为统治阶级涂脂抹粉。我的那篇文章“雍正前苗族社会考”，就是批判这种说法的。乾隆三年搞的事，到乾隆五十五年修大清一统志，它也不敢隐讳，那时欺君之罪是要砍头的，没有这些事情，造也造不出来。《清江志》上面也记载着，谁怎么立的功，谁昼伏夜行，谁说服了

哪些苗寨，都有详细的记载。大量的事实证明，他不但不改土归流，还在这里设土官，把苗族人民镇压下去，这些铁一般的历史事实，是无可辩驳的。

回头来讲一下包利、红银、老伦三位英雄人物的结局。包利早死，到乾隆五年还被“戮尸梟示”。红银、老伦被同时取斩。为了反抗满清官府，为了争取苗族人民的自由和解放，他们的牺牲是壮烈的。所以，后来人们在古州建立“苗王庙”纪念他们。

从那以后，苗族人民就在屯堡的管制下生活，一个屯堡，就等于现制的一连人，几十支枪，而苗族一支枪也没有了，甚至鸟枪和大刀都被搜走了。剑河境内的二十一屯堡都筑起了土城，把整个县的苗民压得喘不过气来，敢动吗？哪个动就把那个消灭。土官已经钻到苗族人民的脑子里去了。他们有他们的统治方法，苗寨里谁说了什么话，谁敢图谋造反，他们很快就能知道，很快就有人报告土官，土官上报给通判，通判就将人抓起来办罪，叫你想跑也跑不脱。所以，后来松桃苗民起义，这里一直动不起来，就是因为有土官和屯堡压起的缘故。除了土官和屯堡，这里还设有汛地，如白索汛、摆尾汛等等，这些汛地都驻扎有兵勇。所以从乾隆六十年，嘉庆二十五年，道光三十年，前后共约一百一十多年时间，苗族人民一直被压得不敢动弹。在这一时期里，苗族人口是发展了，虽然人口增加，但却处于受剥削地位，生活仍然很苦。胡林翼在“论东路事宜启”里说：“官取于民者十之三，土官差役取于民者十之七。”土官差役敲诈苗民钱财，其手段如狼似虎，使得苗民“采蕨为食，终年不得一粟入口。”在这期间，苗民所受的压迫和剥削，其痛苦程

度可见一斑。

三、剑河第二次苗民大起义

从乾隆五年后的一百一十多年时间里，苗族人民深受土官、差役、屯兵的重重压迫，从表面上看，他们是动不起来了。但客观规律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物极必反，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正如胡林翼供认的：“为盗而死，忍饥而死，等死耳。为盗可以赎死，忍饥则将立毙。”这意思是说，当强盗是死，饿死也是死，但反过来，当强盗可以不死，饿死则非死不可。到了这个地步，造反已是必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要活命就要造反。

在下面这一段里，主要讲一讲李鸿基的事迹。李鸿基是剑河久西人，现在叫久胜，隔久结不远，属久仰乡。因汉人对苗语读音不准，翻译也各异，有的翻成李公鸡，那本身就带有诬蔑之意，从前我到久嘎看到一块石碑，那是满清时候，贵州总兵戈健的幕僚为吹捧他而立的，那碑文中便译成李公鸡。湖南巡抚刘昆给朝廷的奏折中称李恒吉。。贵州《苗族简史》审稿讨论会翻译成李弓吉，这些音译都不够准确，还是李鸿基比较接近，所以我在写这段历史时，便称李鸿基。

李鸿基生长的年代，正是苗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时代。他年幼时，随父亲上坡干活，父亲对他讲，屯堡所占的那些田，都是我们苗家祖祖辈辈费尽辛苦开出来的，现在都被他们霸占去了，不知哪年哪月我们苗家才能回到自己的田里耕种？得顿饱饭来吃。这些话，对李鸿基幼小的心灵影响很大。从那时起，他便孕育了造反的念头。

胡林翼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招募有一队苗兵，开始

这些苗兵很能吃苦，也很能打仗。但是，到后来，他们打到了太平天国驻过的地方，听当地老百姓说，太平天国是为了要分田地才来和官家打仗的。这在他们的思想上起了一些变化，他们想：我们也是穷人，也受着官家的压迫，我们应该同他们一起打官家才对。这时，胡林翼也看出这队苗兵不稳当啦。到了武昌就将他们解散了。这些苗兵沿江上来，他们在队伍中原已学会拳术武艺，刀叉棍棒样样该会，为了生活，他们沿途卖艺，开堂教拳教武。其中有两个武艺很好的人，叫高禾、久松，这两人来到久结教拳，结识了李鸿基。当时前来学拳的人很多，且大部分是苗家青年。高禾、久松一边教武，一边传播太平天国“打官家分田地”的革命思想。高禾、久松都是台拱人，教了一段时间，他们就回台拱去了。李鸿基在他两人的启发诱导下，学武的劲头很足，加上他聪明睿智，臂力过人，很快便学会了十八般武艺。高禾、久松很器重他，三人便成莫逆之交。当时贵州绿营已经腐败，屯堡名存实亡，在这种情况下，正是苗家起来造反的大好时机。有一次李鸿基到台拱拜望高禾、久松，在那里又结识了包大肚、九大伯和张秀眉等人。几个人聚在一起，谈论起满清朝庭的腐败，谈论起苗家世代经历的苦难生活，激起了满腔义愤，相约着各地苗家联合起来造反。

在咸丰以前苗家是没有上粮任务的，雍正说过不叫他们上粮，免得他们造反。以后乾隆又明降谕旨：“蠲免田赋”。那么官粮怎么办呢？他搞了一个“采买军粮”的办法，就是用银子向苗民采买军粮，一斗米红银一钱六分。过后不久，这办法行不通了，因为这样做地方官员在老百姓身上捞不到油水，就改成征粮不给钱。到了咸丰初年，台拱同知张礼度

又另搞一个花样，要钱不要粮。比如你这个寨子需征粮两石，不要你交粮，而折成银子上缴。苗民历来都很穷苦，哪来的银子上缴呀！《贵州通志》上有这样的记载：“有自掘祖宗坟墓，取银饰来交者。”事情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台拱的苗民忍无可忍，于咸丰五年自发地集中很多人，冲进台拱城，将贪吏吴复活活打死。这是当时的一根引火钱，接着便爆发了苗民大起义。千里苗疆，莫不响应。事情发生后，张秀眉、包大肚、九大伯、李鸿基等集中到台拱掌梅里开会，确定了“扫清小据点，孤立大城市”的战略方针。当时的屯堡是腐化了，但他的汛地还驻扎有兵。只有将这些汛地一个个地收拾掉，最后才好集中力量攻打县城，于是他们就先打搞贡汛，接着打岩门司，岩门司拿下之后，李鸿基听说丹江、都江等都被别的起义军攻下了，他便与高禾、久松一道回到久结，召集他们原来一块练拳习武的人，各人自备武器，带领各寨苗族青壮年起来造反。几天工夫便集中了一千多人，在议榔坪杀牛议榔，宣布起义，“打官家分田地。”人集中起来以后，虽然把散藏在民间的武器全数集中起来，但仍很不够用。有几支鸟枪也只能打砂子，大刀和长矛也不多。为了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决定先打白索汛，白索汛在章汉堡对面，那是高山上的高山，至今还保留有跑马场、上马墩和台阶的痕迹。那是一个守备镇守的地方（守备相当于现制的副团长）。白索汛原是一个大寨子，有四百多户人家。守备官原有五百多个兵，三百多支枪，还有大刀长矛之类。乾隆以后，到了嘉庆、道光时期，便逐渐地腐化了，那些汛官守备经常住在城里，上面不过两三百兵，这些兵每月只有一两的饷银，不够吃用，得要自己种田，在这种情况下

下，战斗力当然就相对减弱了。李鸿基他们宣布起义后不几天，利用夜晚摸进去将他的汛地占领，那些兵有的跑脱，有的被杀。起义军将他们的武器库打开，得到许多枪枝和大刀长矛，还有许多火药铅弹，用以装备自己，起义军的战斗力得以进一步加强。白索汛被拿下以后，章汉堡一带的土官和地主都往城里跑，李鸿基便将他们原来所霸占的田没收过来，分给当地的苗民耕种，谁种谁收，也不交租交粮。

起义军打下白索汛不久，接着去打朗洞营，朗洞营原是古州镇分驻的一个营，是一座石城，城墙很坚固，驻有一千多兵，原是镇压苗族的一个营盘重镇。李鸿基率领起义军利用晚上去摸营，用竹梯在城边爬上城墙，上去后一顿子砍牛刀，将守城的兵士杀的杀死，赶的赶跑，朗洞城就这样很顺利地占领了。在那里又得了不少的武器，起义军的声威也就更加壮大了。

公历一八五六年(咸丰六年)正月，李鸿基率领起义军围攻清江城，他们在打白索汛和朗洞城的时候很容易得手，对清江城亦很轻视。殊不知清江通判余义悖闻知白索汛失守，朗洞城被占领，内心震惊，因此对城防工作抓得很紧。余义悖忠君思想很重，立誓为皇上效忠而死。为了守住清江城，他不仅加固了城墙，而且在城垛上设灯笼火把，日夜坚守。当李鸿基他们来爬城时，灯笼火把齐明，枪弹箭弩齐射，加上滚木擂石齐下，使义军付出很大伤亡都没能接近城墙。李鸿基急了，亲自挥舞着大砍刀，率领精壮就要强攻，当即被高禾、久松制止，并对他说：“清江城是用坚硬的大青石筑起来的，异常坚固，易守难攻，且余义悖是个懂得战略的战将，防守很严，若强攻，必招致重大伤亡，且不易奏效。我